

陶敏●著

全唐詩人名彙考



遼海學術文庫

遼海出版社



全唐詩人 果考

陶
敏
著

遼海出版社

© 陶 敏 2006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全唐詩人名彙考/陶敏著. —瀋陽: 遼海出版社, 2006. 12
ISBN 978-7-80711-826-8

I. 全... II. 陶... III. 唐詩—姓名—考證—中國
IV. I 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060257 號

責任編輯: 徐桂秋 叢立先
封面設計: 陳 斌
版式設計: 仲菲菲
責任校對: 郭 醒

出 版 者: 遼海出版社

地址: 沈陽市和平區十一緯路 25 號

郵編: 110003

電話: 024—23284460

E-mail: dszbs@mail.lnpgc.com.cn

http://www.lhph.com.cn

印 刷 者: 沈陽市第六印刷廠書畫彩印中心

發 行 者: 遼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6mm × 208mm

印 張: 49.5

字 數: 1200 千字

出版時間: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時間: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180.00 元

遼海學術文庫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世襄	楊 義	陳高華
羅宗強	周勳初	徐蘋芳
樓宇烈	傅璇琮	傅熹年
戴文葆		

序

傅璇琮

一九九〇年元月，我曾爲吳汝煜、胡可先同志的《全唐詩人名考》作序，現在，在一年稍多幾個月之後，我又爲陶敏同志的這部《全唐詩人名考證》作序。爲這兩部性質相近而各有特色的著作的出版，能盡我的一點微力，表達我對著者的欽佩之情，并以這兩篇短序來表達我對他們辛勤勞作的謝意，我覺得這是我的榮幸。

吳、胡兩位的《全唐詩人名考》約六十餘萬字，陶敏同志的這部《全唐詩人名考證》八十餘萬字。它們都是有益于學林的好書，不過比較而言，前者以相當的篇幅總括已有的成果，而以平實見長，後者則頗着眼于力破陳說，以獨創新見引人注目。我曾在好幾處說過，在近代治唐史學者中，傾其主要精力用于人物與史事考證的，創獲最多，可資利用的成果也最豐碩的，要算岑仲勉先生。我覺得，在目前，真正按岑先生的治學格局走而心不旁騖的，于中青年學者中，一位是復旦大學的陳尚君，再一位就是本書著者陶敏。陳尚君同志曾以《全唐詩誤收詩考》（《文史》第二十四輯）一文，使人們歎服其資料掌握的廣博和論析的精細，他的《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登科記考補正》一系列唐代史料的輯補工作，使人們感到他的工夫的厚實。而陶敏同志，

則真正是沉潛于史料的海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限于一家一集，既廣泛占有資料，又窮究史源，而其筆力所向，則集中于攻人物考證，看來範圍稍窄，卻所獲極精，也正因為拿出來的是精品，即使人感到內涵的深廣。

這里不妨舉幾個例子。

例一：《全唐詩》卷七二三收有李洞《上靈州令狐相公》七絕一首：“征蠻破虜漢功臣，提劍歸來萬里身。笑倚凌烟金柱看，形容憔悴老於真。”本書認為唐末無以姓令狐為宰相而領靈州者，首句“征蠻破虜”云云，亦與靈州不合。此詩《文苑英華》卷二六二題作《贈高僕射自安西赴闕》，云安西，亦與“征蠻”不合，且安西自貞元三年陷蕃後唐朝廷即未曾除授官吏。經考證，此處安西當作安南，而高僕射即為高駢。據《新唐書》本傳，高駢于咸通中為安南都護，大破南詔兵，“拔安南，斬蠻帥段首遷，降附諸洞二萬計”，乃以安南都護府為靜海軍，授駢為節度使，後又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李洞這首詩，即于高駢為檢校尚書右僕射自安南還朝時作。這樣，就不僅考證出人名，而且糾正了《全唐詩》和《文苑英華》的文字之誤。

例二：《全唐詩》卷一二七載王維《和宋中丞夏日游福賢觀天長寺即陳左相宅所施之作》。此詩自清人趙殿成注，至現代學者如陳鐵民、張清華同志所作年譜，楊軍同志所作詩文繫年，都定于天寶時所作，即以陳希烈時任左相。但他們都未注意到詩的首二句“已相殷王國，空餘尚父溪”的用典。詩蓋謂陳希烈于天寶中為左相兼兵部尚書，深受唐玄宗的信任，而安史亂兵陷京洛，陳希烈竟相安祿山，猶太公望被周武王尊為“尚父”而竟相周之敵國殷；今陳希烈亂平後被殺，唯餘舊溪，受人憑弔。詩題中之宋中丞，即宋若思，也是在安史亂起後任為御史中丞，至德二載（757）尚在位。此詩當作于肅宗時，絕不可能作于天寶中。如此，則不僅考姓名，而且訂作年，于舊說也多所匡正。

與此類似的，又如例三：《全唐詩》卷二〇一岑參《崔倉曹席上送殷寅充石相判官赴淮南》。此處石爲右之訛，前人的意見一致，但右相爲誰，卻衆說不一。岑仲勉《讀全唐詩札記》謂“右相即中書令，崔圓曾爲之，罷相後出鎮淮南，寅蓋充圓之判官”。李嘉言《岑詩繫年》則以爲是元載，陳鐵民等《岑參集校注》謂指劉晏，他們都認爲詩即作于代宗廣德元年（763）。這些說法表面看起來似都有一定道理，但他們卻偏偏忽略了殷寅生平資料。據徐松《登科記考》卷九，殷寅天寶四載（745）進士登第。又顏真卿《殷踐猷墓碣》（《全唐文》卷三四四）載：“三子：攝、寅、克齊等”。又謂寅曾任永寧尉，後因事貶爲澄城丞。這篇墓碣又說寅“久疾將歿，顧瞻太夫人，欲訣不忍”。則殷寅死于其母之前，而其母乃卒于乾元元年（758）。又據《舊唐書·楊國忠傳》：“會（李）林甫卒，遂代爲右相。……凡領四十餘使。”李林甫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卒，時岑參正在長安，詩題之右相蓋指楊國忠。殷寅既卒于乾元元年之前，則詩作于廣德元年即不可能，右相指崔圓、元載、劉晏等說也無從着落。

對陶敏同志來說，他的工夫不僅僅在對資料的廣泛搜集，還在于他對這些資料的精思。如《全唐詩》卷四九二載殷堯藩《送白舍人渡江》，一般都以此詩爲殷與白居易交往之證，但引用者都未注意到詩中“橫鎖已沈王濬筏，投鞭難阻謝玄兵”一聯。此處反用歷史故實，用來描述南北對峙，南方對北方作戰獲得大勝，中唐時期何來此種情勢？陶敏同志于此產生疑問，乃更進而搜尋資料，终于在明人史謹的《獨醉亭集》卷中發現此詩，而“白舍人”三字則爲作僞者所加，詩之末句“回首鐘聲隔鳳城”之“鐘聲”，史謹原詩作鍾山，改作之迹更爲明顯。《唐音丁籤》所說宋本殷集實爲明人僞造，陶敏同志由此更考得《全唐詩》中殷之《春游》即爲元人虞集《城東觀杏花》，《帝京二首》等三詩爲明吳伯宗詩，《暮春述懷》等十六首爲明史謹詩。他又有《全

唐詩殷堯藩集考辨》一文，載《湘潭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九〇年第五期，是近年來唐詩學界考辨唐集的力作之一。

陶敏同志並不專注於某一家的考證，但由於他能博採衆書，融會貫通，遂能收左右逢源之功。如他對孟浩然詩中張明府、張郎中，儲光義詩中張侍御的考證，即十分精彩。孟浩然有《同盧明府餞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海園作》、《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等詩，儲光義亦有《同張侍御宴北樓》詩。由於孟浩然與張子容有交往，有詩相贈答，因此有些研究者以為孟浩然詩中的張明府、張郎中即指張子容。本書據兩《唐書》的有關紀傳，《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四之《張點墓誌》，《唐會要》，《兩浙金石志》卷二之《唐徐嶠張愿詩刻》，《唐文拾遺》卷二六之崔歸美《張嘯墓誌銘》，考證出孟浩然這些詩中張明府、張郎中、張侍御（應作郎），都為張愿，陶敏並不專門研究孟浩然，但張愿的考出卻大大有助於對孟浩然交游的瞭解。

這部人名考，在不少地方對唐詩文字的校勘提供極為有價值的參考。前不久，我與美國密支根州立大學李珍華教授共同校點《河嶽英靈集》卷下王昌齡詩，宋刊本有題為《鄭縣宿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而《四部叢刊》影明本，此詩詩題中“太”作“大”。“陶太公”未始不可通，且又是二卷本的宋刊，較三卷本的明刻當更接近於殷璠的原編，因此對太、大二字如何抉擇頗為猶豫。後來見到陶敏同志的這部文稿，我特別翻閱了王昌齡此詩的考證，方始冰釋。陶敏同志認為此處應作大，大為陶翰的行第。陶翰開元十八年進士登第。又據《寶刻叢編》卷十華州：“《唐華嶽真君碑》，唐華陰丞陶翰撰，韋勝書，玄宗開元十九年，加五嶽神號曰真君，初建祠宇，立此碑。”又據陶翰《餞崔朔司功入計序》及《新唐書·玄宗紀》，知開元二十年冬陶翰即在華州。而王昌齡詩云：“子為黃綬羈，予忝蓬山顧”，“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王昌齡開元十五年進士登第，後為秘書省校書郎，

故云蓬山，而黃綬即指時任華陰丞的陶翰，其時也正好在開元二十年。這樣，我在校記中即確定太應作大，并特地注明引用陶敏同志的成果。

限于篇幅，我只能舉這幾個例子，而且很可能這幾個例子還不足以充分代表本書的工力。細心的讀者當不難發見，書中對於《全唐詩》的考證是多方面的，有考定姓名的，有訂正姓名訛誤和地名訛誤的，有考定作詩年月的，有糾正《全唐詩》誤注的，有改正前代記述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自岑仲勉先生的《讀全唐詩札記》以後，還沒有一部書像本書那樣，以人名考證為中心，對《全唐詩》作如此廣泛而如此專注的核查，而它所獲得的具體成果，比之于《讀全唐詩札記》，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人們或許以為本書的作者定是一位埋首于唐詩數十年，大半生與古籍打交道的老先生，殊不知陶敏真正鑽研唐詩，還不到十年的時間，而在此之前他確有一段極不尋常的崎嶇坎坷的經歷。

他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生于湖南長沙一個教師的家庭，自小即喜愛唐詩宋詞以及《三國》、《水滸》等古典小說。一九五五年秋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當時他聽了沈祖棻先生的唐人七絕詩講解，劉賡先生的文字學、音韻學，黃焯先生的詩經研究，劉永濟先生的楚辭研究，席魯思先生的荀子研究、史記研究。這些雖非系統而卻以精博見長的講授開啓了這個來自瀟湘之濱的青年的求知心，使他面對古老豐厚的文化油然而生一窺寶藏的壯志。但這棵早春的幼苗卻遇上一場意想不到的風雪，終于受到摧抑而得不到正常的發育。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補課，把陶敏糊里糊塗地補了進去，此後二十多年的歲月他就與古典文學絕緣。一九五九年九月畢業後分配在遼寧師範學院，坐了半個月的冷板凳就下放到農場勞動，每月二十八元生活費，喂了一年多豬，養了幾個月鴨子，地點就在大連附近金縣的海濱。一九六〇年十月摘去了帽子，但仍在農場勞動。一九六一年四月，學校與吉林四平聯合收

割機廠協商，居然將他去換了農業機械。此後，陶敏就在四平這家工廠呆了十八年，但總算是免去了勞動，開始是在紅專大學，接着是在業餘學校和半工半讀中學教書。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陶敏當然在劫難逃，又被以新罪名而受到揪鬥，于是又重新勞動，後又到農村插隊三年。一九七二年調回四平收割機廠，先後當過教員、車間成本、材料員。這樣，直至一九七八年甄別改正時，曾去武漢大學調查，卻未在學校及他個人檔案中，發現他當年之所以劃為右派的任何證明材料，而整整二十年的大好時光就如此地過去了。不過，至此他也就調回湘潭師專（後改名湘潭師院）工作，總算撥雲霧而見青天了。

在近十年中，陶敏同志專注于唐代詩人的考證，發表了四十多篇文章，約三十餘萬字。又與郁賢皓兄合作整理《元和姓纂》，全書二百多萬字，將在中華書局出版。他又有一部《劉禹錫詩編年箋注》稿六十餘萬字，待印。這些都為這部人名考作了準備，打了基礎。

人們不難想象，以陶敏同志上面所說這樣的經歷，在唐詩考證中作出如此的成績，他在這不到十年的時間內要付出多少辛勞。陶敏曾對我說他走的不過仍是中國傳統的路子，不過由于他搞的窄，所以有可能搞得細一些。他說的很樸素，但卻很有道理，很有見地。有些搞大學問的，固然可以把攤子鋪得很開，但我還是相信莊子的話：“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逍遙游》）面對學術的海洋，我們一般的人，還是就性之所近和力之所及，在一定的範圍內搞得精一些、深一些為好。過去的十年，古典文學研究也確實是五花八門，陶敏同志并不去趕熱鬧，老老實實地讀書，一個人名一個人名地考過去，而終於寫成八十餘萬字的實實在在的著作。我始終認為，搞資料的搜集和考證，是一種造福于他人的、使大家受益的工作。正如清代學者王鳴盛所說：“予任其勞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難而使人

樂其易。”（《十七史商榷》自序）我們搞唐代文史的人，不是到現在還感受到岑仲勉先生幾部考證之作的好處嗎？我深信，陶敏同志這部著作的出版，不僅僅是向我們提供許多我們可以稱引的具體成果，還將有助于唐代文學研究界已經形成的踏實學風的進一步發揚。

一九九一年四月于北京

自序

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章下》）知人論世，是我國古代詩歌賞析研究的傳統方法，也是我們今天解讀詩文、探求詩旨的一種最為切實可行的方法。不瞭解詩中的人和事，就難以確切判定詩作年代，了解寫作背景，做到真正的“以意逆志”。所以，要“知人論世”，瞭解詩中的人物可說是一大關鍵。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開始從事劉禹錫詩集的整理，首先碰到的就是詩中人物陌生的問題——由于詩中涉及的人物往往只稱官職、行第而不知其名，或是知其姓名而不知其事迹，因而難以編年作注。爲此，我閱讀了大量的唐代文獻，耗去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終於對劉禹錫詩中衆多的人物和他們的事迹有了比較充分的瞭解，也有不少前人及時賢未曾注意到的新的發現。從一九八一年第一期開始，《湘潭師專學報》連續刊出了我的《讀劉禹錫詩札記》，頭兩期還能兼顧賞析，後來幾乎全寫成了人物和史事的考證，編輯先生看了直搖頭，連載了六期之後，終於難乎爲繼了。但是，我卻樂此不疲，覺得這項工作很有意義。我嘗試讀杜甫的詩，發現其中同樣有不少可考而未考的人物，曾寫成《杜甫交游新考》及《續考》發表在《草堂》及《杜甫研究學刊》上。千家注杜尚且如此，遑論其它，于是，一個全面考察《全唐詩》中的作者和人物，寫作《全唐詩作者考》和《全唐詩人名考》的計劃，就初步形成了。當時，經由程千帆師介紹，我得以結識正在湘潭大學講

學的卞孝萱先生，并就此事向他請益。他對我的想法給予了充分肯定和熱情鼓勵，并介紹我與正從事《唐刺史考》寫作，對唐代人物特別關注的郁賢皓先生相識。除了在頻繁的通信中交流資料與心得外，郁先生還為我去南京查閱資料提供各種便利，熱情邀請我參加他與已故孫望先生正從事的《元和姓纂》與《元和姓纂四校記》的整理。這兩部著作廣泛涉及唐代人物，保存了豐富的史料，使我獲益匪淺。此外，復旦大學陳尚君先生為我複印了大量資料（如饒綜編《唐宋墓志——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將他藏書中的複本（如百卷本《說郛》、《中國叢書綜錄》）贈我，并將他多年搜集編纂而成的《全唐文補編》稿本供我參考。諸位先生對唐代文學研究的狀況和進展，對唐代文獻史料特別是石刻史料和海外漢籍全面深入的瞭解，更使經歷了二十年右派和摘帽右派生涯雖重返高校但僻處湘中一隅的我眼界大開。可以說，如果沒有前輩師長的鼓勵和指導，沒有朋友們的支持和幫助，要完成這一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一時期，我的腦海中滿滿地裝着形形色色的唐代人物，不管看到什麼文獻史料，都要拿來和他們比對一番，已知姓名的要發掘他們的事跡，未知姓名的要尋找他們的姓名。學校圖書館的古籍室為我“全天候”開放，哪怕是休息日，管理古籍的池先華、李蕙芳女士從不拒絕為我開門。出門在外，更以搜集資料為第一要事。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和妻子武淑珍第一次來南京，陪她瞻仰了中山陵後，我就一頭鑽進了圖書館，只買了一張南京導游圖，請她自行游覽。次年十月，我再來南京參加歷史文獻研究會第六屆年會，除了參加開幕式外，剩下的幾天都是在南圖度過的。在故紙堆中尋尋覓覓，固然十分枯燥乏味，然而卻也樂在其中。記得一九九〇年我和尚君參加《全唐五代詩》編纂的籌備會議，住在西北大學賓館。一天中午，他去逛舊書店，帶回了一疊雜誌和幾本影印出版的宋蜀刻唐集。我翻閱一本《文博》，發現

一篇文章介紹了西安新出土的宋進馬宋應的墓誌，我聯想到王維集中有一篇《宋進馬哀詞》，序中說宋進馬是“中書舍人宋公”之子，馬上找來對照，果然，王詩所云和墓誌若合符節。原稿中懷疑“宋進馬”是宋昱的兒子，不知姓名，看到墓誌後不僅可以斷定宋進馬為宋昱之子，而且確切地知道了他的姓名事迹以及王詩的作年。我和尚君不禁相對撫掌大笑。我們馬上把這個發現告訴了長期從事王維研究的陳鐵民先生，他也十分高興。

一九八八年，經過近十年的努力，一部九十餘萬字的《全唐詩人名考》初稿終於完成了。但是，這部書稿的出版並不順利。最先，郁賢皓先生曾將它推薦給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社表示可以接受。但不久，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吳汝煜、胡可先的《全唐詩人名考》，一省之內出版選題不可能重複，此書遂遭退稿的命運。古道熱腸的郁兄先後聯繫陝西人民出版社和巴蜀書社，未成（巴蜀書社曾來信索去書稿并請人審稿），又將此稿向傅璇琮先生推薦，請他作序并介紹出版。前此，傅先生和我已有書信往來，也讀過我的一些文章，對我有所瞭解，便慨然允諾。他很快撰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言（發表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南京召開的首屆唐宋詩詞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後收入臺灣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唐詩論學叢稿》，又改題為《坎坷的經歷與純真的追求》，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濡沫集》中），但聯繫出版之事仍不順利（據傅先生來信說，北京幾家出版社都認為此書篇幅太大，恐怕賠本因而“面有難色”）。幾經周折，最後他建議我將此稿加以壓縮，改題為《全唐詩人名考證》，列入他所主編的《全唐詩研究集成》叢書，交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至此，我懸着的心終於放下，至于壓縮篇幅，改繁體字為簡體，重新謄寫校對，那都是小事一樁了。謄寫刪訂工作在一九九一年底全部完成，接着是等待、閱校、再等待。一九九五年，西安忽然來信，說程千帆先生所題籤已遺失，要我請程師補作。七月四日，八十

二歲高齡的程先生將書籤寄下（這已是他老爲此書第三次題籤了，第一次題寫書名爲《全唐詩人名考》，但自江蘇古籍取回稿件時，原件已失），并來信說：“古人云，學業既成而聲聞未彰，朋友之過。璇琮推轂，亦友道也。書願及早誦之。書籤勉作，老無筆力，爲愧。”但隨即接到西安來信，又說原書籤已找到，這個書籤遂成爲我的珍藏。一九九六年九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八屆年會（西安）會議期間，我來到陝西人民出版社，終於拿到了二十冊樣書，才第一次見到此書的責編，一位姓魯的先生。據他介紹，他已是這本書的第三位責編了。原來，由于出版社沒有專門從事古籍出版的編輯，責編屢經更迭，書稿的校對也是請社外的人擔任的。前面一位責編不幸喪生于電梯漏電的意外事故，一切工作都來不及交待，當時，不僅是書的題籤，連校樣都不知在誰的手里。得知此事，我只有連呼萬幸。書稿出版不易原在意料之中，但居然會和性命攸關的意外事故聯繫在一起，卻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了。大約我的書和人一樣，都有些不祥的味道吧。

《全唐詩人名考證》出版以後，頗受學界好評，見諸報刊的書評有郁賢皓《〈全唐詩〉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湘潭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九七年第二期、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九期全文轉載），郁賢皓《陶敏著〈全唐詩人名考證〉評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一九九七年第九期），李一飛《有益于開拓唐詩研究的力作》（《湘潭大學學報》一九九七年第五期、《中國詩學》第六輯），陳尚君《全唐詩人名考證》書評（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唐研究》第三卷、一九九七年《唐代文學研究年鑒》），吳廣平《皇皇巨著，新見迭出》（《湘潭師院報》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吳廣平、符均《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有時代特色》（《書海》一九九七年第六期），劉再華《〈全唐詩人名考證〉評介》（《咸寧師專學

報》一九九八年第一期)。承朋友見告，還有一位陳飛雪先生撰寫了一篇題為《一部宏富精深的考證佳作》的書評，發表在一九九九年六月九日《人民政協報》上。遺憾的是，我至今仍不認識這位陳先生，也沒有拜讀過他這篇大作。此外，在周勳初、蔣寅諸先生介紹唐詩或唐代文學研究的文字中提及拙書也多有溢美之詞。一九九七年，《全唐詩人名考證》一書獲得湖南省第三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次年又獲得第二屆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文學類二等獎。

但是我清醒地知道，這些稱贊和榮譽，更多的是對我在經歷坎坷人生後投身學術事業的勇氣和努力的肯定，至于書的本身，闕失甚多。正像我在此書《校後記》（由于前面提到的意外事故，此文未能載入書中，刊于《湘潭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九七年第一期）中所說，書雖然出來了，可是我“反而覺得對讀者虧欠了一些什么”，因為從完稿到出版歷時八載，看校時已發現“書中存在若干失考或誤考之處，已考人名事迹尚多有可補充者”。此書印數甚少（僅一千冊，我所得二百冊早已送罄，近仍不斷有來信索求者），加上責編不斷更換，校對不夠仔細，錯字甚多。激光照排技術在內地印刷業應用還剛剛起步，缺乏經驗，一些在計算機上造的字，因為更換計算機而未拷貝造字文件變得離奇古怪，令人啼笑皆非，這些都留下了許多遺憾。二〇〇五年，遼海出版社于景祥、徐桂秋兩位先生建議我重印此書。幾乎同時，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聘請我擔任該中心的講座教授，並將此書的修訂及《全唐詩作者小傳補正》的撰寫列入中心的規劃。因此，我決定借此機會對《全唐詩人名考證》作一次全面的修訂。

修訂後的《全唐詩人名考證》改題為《全唐詩人名彙考》，這主要倒不是為了將二者加以區別，而是因為，我作此書的初衷並不是單純考證人名，還旁及與人名考證相關的詩作繫年、同題唱和、重出詩及偽詩甄辨、詩題文字糾誤等問題，改為“彙考”，

似乎更加名副其實一些。這次修訂除改正錯字、校核引文外，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首先，是對原書的內容作了較多的增補和刪改。十多年來，學界的《全唐詩》研究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如殷堯藩、牟融集被考訂為偽造，唐彥謙集中發現了戴表元、許謙詩的大量闕入，出自《漢上題襟集》的周繇襄陽唱和詩被證明為元繇的作品，原書中有關文字，如誤考王建詩中之柏侍御為柏耆，牟融詩中之范使君為范傳正，將周繇考為二人，一字允元，一字為憲（字為憲者當為元繇），都必須刪削或重新改寫。十多年來，我繼續關注唐詩中人名問題，發現原書對傳世文獻的利用還欠充分，新出唐代墓誌提供了許多新的史料，人名考證又有較多發現，人物事迹可作較多補充。如書中據《朝野僉載》考宋之問《端州別袁侍御》之袁侍御為袁守一；據《程伯獻墓誌》考王維、孫逖等《故程將軍妻南陽郡夫人樊氏挽歌》之程將軍為程伯獻，樊氏為樊周；據《不空表制集》及乘如殘墓誌考王維詩中之蕭居士為蕭時和；據《宋遙墓誌》考儲光義《晚次東亭獻鄭州宋使君文》之宋使君為宋遙，“文”字非使君名；據《歷代法寶記》考岑參《青山峽口泊舟懷狄侍御》中狄侍御為狄博濟，杜甫《贈董卿嘉榮》中董嘉榮為川西少數民族首領、西山防秋軍將；據《柏元封墓誌》考王建詩中柏侍御為柏元封；據唐人墓誌及筆記考訂劉禹錫、王建等人詩中之九仙公主即玉真公主；據《全唐文》常袞所行制考鮑溶《送薛補闕入朝》詩中之薛補闕為薛兼訓之弟薛兼適；據《高瀚墓誌》及《苗紳墓誌》考定李商隱詩中之“成都高苗二從事”為高瀚、苗紳，時在李回幕中，而姚鵠《旱魚詞上苗相公》則為苗端公之誤，即苗紳；據范鄭作《范眉孫墓誌》考定李頻詩中之范書記、范評事、范秘書均為范鄭；據《廬山記》考定修睦詩中之田道者為釋常真，等等，就都是此次修訂所增補。類似改定或補考人名的約有一百餘處。至于為已知或已考出的人物補充事迹的